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年，331頁。

林玉茹著《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出版的「臺灣史研究專刊」系列第一號專書。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其研究領域主要有臺灣商業史、社會經濟史、清代臺灣史、區域研究、臺灣海洋史等，1997年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獲博士學位，該書是在其有關臺拓在東部的研究論文的基礎上集結成書的，是在《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之後的第一本系統性專書。

首先，作者在緒論中闡釋了「殖民地邊區」與「國策會社」兩個概念，從而進一步說明東臺灣的特殊性，西部開發的一些理論如「殖民地剝削論」、「從屬化」等並不適用於東臺灣，並指出了國策會社在東臺灣內地開發與區域發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者強調「邊區」這一概念，認為邊區相對於其他地區處於未開發或者發展滯滯的區域，與施添福的觀點相同，認為日治時期的臺東廳與花蓮港廳交通不便、自然條件不佳，族群複雜，開發較晚，在臺灣的政治與經濟發展體系上始終處於邊區位置，殖民遭遇也與西部不同，即稱之為「殖民地邊區」。而且以往討論日治時期臺灣殖民經濟史的專論，往往將臺灣視為一個同質單位，指稱臺灣如何在日本帝國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現代化或是從屬化，而作者注意到從清代以來臺灣即已產生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特別是遲至晚清才開發的東臺灣地區，其發展軌跡相對於臺灣西部地區的特殊性。作者認為無論是殖民政府對東部的特殊化區域政策，還是東臺灣企業發展歷程看其邊區性格，全稱性的殖民地經濟史命題，此時就無法解釋殖民地的邊區，作者正是把握住了「殖民政府在邊區的經營，應可以反映日本殖民主義的另一面貌」（頁4），由此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作者也注意到以往對於戰時日本企業的研究，大多着重於財閥與軍方、政府的角力和關係，而較少注意到國策會社的角色。作者解釋了「國策會社」的概念，臺拓與東拓均為拓殖型國策會社，與一般私人會社不同，該社資本屬半官半民性質，人事組織與營運方向又受到帝國和殖民政府的監督，有執行政府政策的義務。其經營方針和事業發展極度受國家意志的影響。臺

拓作為「國策代理機關」創立使命是以經營臺灣島內和華南、南洋地區的拓殖事業，提供拓殖資金為目的。因有國家信用作為憑藉，短時間發展迅速，是因應日本帝國主義發展和戰爭特別需要的產物。作者在第二章中詳細地論述了關於臺拓的經營體系。

作者注意到過去的研究注重於臺拓的海外擴張，較少專門探討其島內事業與區域發展的關係，特別是臺拓對殖民地邊區的影響。而作者認為對於戰時臺拓的任務與角色，島內島外事業應該分開討論，海外事業常面臨軍部和其他會社的影響，而臺拓的島內事業因主要執行總督府意志，有更多的特權和主導力。因此，作者以一個地區為研究區域，探討國策會社和臺灣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如何透過臺拓進行各地的資源開發和工業化。另一方面，從國策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中也可以看出，殖民帝國的整體戰略佈局如何影響殖民地邊區開發，戰時殖民政府又是如何竭盡所能地運用島內資源的（頁28）。

正如書名所示，本書基本上從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改造的觀點，以臺拓在東臺灣地區的經營為例，探討戰時經濟體制下殖民政府如何在日本帝國的整體戰略佈局下，透過國策會社積極進行殖民地邊區的資源開發，並進一步探討國家、企業以及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頁14）。

全書共有六章，除了第一章「緒論」和第六章「結論」之外，分別為「經營系統：特殊的邊區機制」；「土地開墾與栽培事業：國家與企業共構下的農林開發」；「移民事業：軍需產業與移民政策的轉向」；「投資事業：資本主義化與工業化的推動」。而筆者認為可以進一步地將本書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即第二章，第二部份即第三、四、五章。主要依據是，本書主要是從「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改造」的角度，分析在日本帝國主義擴張之下，國策會社臺拓在東臺灣的經營、成效及所反映的意義。該社在東部的事業，主要包括第三、四、五章所涉及的農林事業、移民事業、投資事業。第二部份在第一部份的基礎上說明臺拓特殊的邊區機制，進一步詳細地闡釋臺拓所經營的事業內容、成效和意義。

第二章闡明了臺拓成立的背景、國策會社的任務及經營東部的理由，透過臺拓的組織結構，分析東部位階及其演變，闡明臺拓在該地特殊的邊區機制，最後重建東部組織的人員組成，進一步討論其事業規模、經營特色及在南進農墾人才培植上的角色，反映發展策略明顯地由早期「重臺東輕花蓮」轉變成「重花蓮輕臺東」傾向，這點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中有進一步的闡釋。第二章所揭示的企業的組織架構反映了其運營管理、事業方針及地域經營的

佈局，為後面幾章的論證作了鋪墊。

第三、四、五章說明了各項事業的內容、演變、成效和意義。第三章以東部最重要的開墾、栽培及造林等農林事業為焦點，從政策背景、開墾事業、造林栽培事業及影響四個方面，探討1930年代後期總督府如何配合戰時國策制訂東臺灣熱帶栽培業發展方針，臺拓如何在資本與勞力上全力配合，及其產生的效應。

第四章指出，在1930年代後半葉，國策會社臺拓為了提供農林事業的勞力，僅在東部移入臺灣人，而非日本人。首先由日治初期內地化東臺計劃的破產和軍需產業開發兩方面，論證臺拓在東部進行本島人移民的理由，其次透過移民事業的規劃、移民招攬、土地耕作及作物栽培，闡明移民事業的內容。最後，從規模最大的本島人農業移民、本島人移民潮在東部的出現及南洋本島人移民的再出發，論述臺拓本島移民事業的成效和意義，進一步討論帝國中央、殖民地政府、地方官廳以及企業家在東部移民政策與執行的落差。基於東臺灣開展的土地開墾、作物栽培事業與移民事業息息相關，第三、四章聯繫較為緊密。

第五章所佔篇幅較大，主要討論投資事業，展現戰時殖民地邊區朝向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的特性。通過解釋臺東廳和花蓮廳產業不同發展途徑的背景和條件，說明各企業的經營與成效，闡明其在殖民帝國軍需重化工業配置中的戰略意義，最後分析戰時軍需產業與花蓮、臺東兩廳區域發展的關係（頁31）。

章節之間互相聯繫，並非孤立，一些內容如第二章涉及到的臺拓在南進農墾人才培植上的角色，第三章涉及的南進熱帶農墾事業的開展與東臺灣經驗的移植等，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臺拓的東部事業與經驗在日本帝國擴張中的戰略位置。這也是作者所要完成的研究目的之一（頁15）。作者總結到：「臺拓在東部的經營策略，隨着日本帝國戰略的變化，大概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又因地域資源不等，也有明顯的空間佈局差異。」（頁264）這兩個階段與「重臺東輕花蓮」、「重花蓮輕臺東」的現象分別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中進行了論述。

另外從第三、四、五章的內容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如何透過國策會社進行邊區區域經濟的規劃與開發，及其對區域發展的影響」（頁15），也是本書所要達到的研究目的之一。即臺拓進入之前，東臺灣低度開發，之後熱帶栽培業和軍需重化工業勃興；產業轉向多元化、計劃化發展；1930年代中葉之後，以臺拓為首吸引了大量的自由移民，先後出現了臺東街、花蓮港

市為區域中心；之前均以農業生產為主，在臺拓帶頭下，展開了東部產業佈局的重塑，形成了「農業臺東，工業花蓮」產業異途發展的現象。

作者認為戰時東部的產業開發，具有殖民地飛地經濟和殖民遺產的雙重性。主要對 J. A. Schneider 提出的「次帝國主義」做了回應，在頁269中，作者就論證了臺拓工業的發展，充分展現戰時臺灣工業化在日本帝國戰略佈局中的計劃性和統制性，臺拓仍是帝國的「戰爭機器」，從而認為 J. A. Schneider 所說的臺拓重視臺灣利益甚於帝國利益的立論不一定能成立。而作者在看到殖民遺產及臺拓在島外事業的自主性的同時，也注意到從日本帝國整個戰略佈局方向來觀察，類比馬若孟(Ramon H. Myers)在滿洲、華北的殖民地飛地經濟的研究，提出了「殖民地邊區飛地經濟」的性質。

正如陳春聲在為《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指出的，作者在史料的搜集和列表方法的運用方面，「表格的內容，大多不是用統計學方法處理過的數據，而是按照作者的分類原則重新編排後縮寫的檔案內容」（《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卷，第2期〔2003年10月〕，頁143）。本書也體現了以上兩個方面。全書有23個表格，附錄中八個表格，詳細地指明資料來源，其內容大多數是作者對《臺拓文書》等檔案的整理，為未能看到檔案的研究者帶來方便與啟發。但是筆者發現作者列表時並非都是對於原始資料的整理，有些表格內容來自其他學者的文章。如表2-1臺拓本社組織系統的變遷，參考張靜宜等的文章（頁52）。作者並未進一步指出其原始資料來源，這是一點不足之處。

本書的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為主，而其建立在對史料搜集的基礎上。涉及到的已刊史料如臺拓所出版的各種事業要覽、《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報》、《臺灣日日新報》、《東臺灣新報》、《臺灣總督府府報》、廳報、各級統計書、會社年鑒以及各類紳士名鑒。作者亦有使用臺人日記，如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說明日治時期東臺灣意象在西部漢人心中的變化。未刊資料則以《臺灣拓殖會社文書》最為重要。這批文書共2,857冊，是目前臺灣少數極完整而豐富的會社檔案，特別是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近年來公開的茗荷谷研修所臺拓相關檔，共13冊，包括昭和十年至十九年（1935-1944）臺灣總督府、臺拓與帝國中央各部門有關該社業務的往來文件。這批文書呈現臺拓事業的規劃，不少是由臺灣總督府、帝國中央以及海、陸軍所提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於作者通過對日本外務省、公文書館以及防衛廳所藏史料及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近年來公開的茗荷谷研修所臺拓相關檔等史料的運用，彌補了前人研究的不足，試圖

闡明帝國中央、總督府至地方廳在東部開發的角色及政策落差。這主要體現在第四章，通過解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的「臺拓計劃書」，明確地說明了日本帝國僅涉及內地人移民的政策，從而論證了與臺拓移民政策的實際情況存在「落差」，為進一步展開討論提供了可能（頁187）。

此外，作者寫作的過程中還注重對比較法的運用。例如在第四章中通過臺拓與東拓、滿拓的比較，突顯臺拓移民事業的特色。「東拓和滿拓最初皆以日本內地人移民為主力，臺拓反而一開始即着重於本島人移民事業，特別是本島人的南洋試驗移民為其特色。」（頁177）再如通過比較1940年後日本、朝鮮及臺灣西部與東部種植作物的不同，體現殖民地邊區作為日本帝國軍需熱帶栽培試驗地的戰略地位。

在本書中作者運用了一些新名詞、新概念，如「共構殖民」（頁81），「殖民想像」、「殖民治理」（頁185），「殖民地工業飛地論」、「現代飛地經濟」（頁191），以及前面提到的「殖民地邊區」等，作者雖有一些解釋，但讓沒有知識背景的讀者理解起來有些困難。這些名詞與概念的運用，都是在其他區域的研究中得出的，它們是否適用於東臺灣地區？作者類比運用分析，雖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東臺灣的殖民開發情況，但是會不會在這個過程中忽視東臺灣的某些特質，出現局限於概念本身、套用概念的嫌疑？另外，筆者認為作者一些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譬如作者提出前人忽視的「帝國中央、總督府至地方廳在東部開發的角色及政策落差」，但三者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與協調等問題，還需進一步的探討。

張程娟
中山大學歷史系